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社会语言学

〔法〕路易·让·卡尔韦 著

商务印书馆

社 会 语 言 学

〔法〕路易—让·卡尔韦 著

曹 德 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1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语言学/(法)卡尔韦著;曹德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3113-3

I. 社… II. ①卡… ②曹… III. 社会语言学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82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知道什么?
社会语言学
〔法〕路易—让·卡尔韦 著
曹德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113-3/H·786

2001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200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3/4

定价:7.50 元

QUE SAIS - JE ?

Louis - Jean Calvet

LA SOCIOLINGUISTIQUE

I^{re}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3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引 言

现代语言学起源于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想要在“言 语 行 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抽象的模式——语 言——的意愿。他的课由他的学生收集整理并在他去世后出版,^[1]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尽管在有些段落中可以找到语言“是语言活动的社会部分^[2]”或“语言是一种社会机制^[3]”的断言,这本书尤其强调“语言是一种只遵循本身规律的体系^[4]”,强调书中最后一句话所述的“语言学惟一的和真正的对象是为语言本身的目的而被研究的语言本身。”就这样,索绪尔在他看来相对立的“语言本身”和其它东西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在这一点上,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耶姆斯莱夫(Hjelmslev)或乔姆斯基(Chomsky)等研究者紧随其后:他们在建立不同的理论和描写体系的同时,都注意确定其科学的界线,并谨慎地将一切不属于他们确定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抽象结构的东西排除在外。

然而,没有讲语言的人语言就不存在,一种语言的历史就是说这种语言的人的历史。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建立在不考虑语言的社会性的基础上的,如果说,根据这些原则建立的理论 and 描写方法显然对语言的全面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本书所阐述的社会语言学却对这些观点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这两种对语言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即在《普通语言学教程》刚出版就已出现。我们发现这两种趋势在最近开始独立发展。一方面,人们强调语言的音位结构和句法;另一方面,人们则强调语言的社会层次或根据社会阶层而变化的不同语言参数。一直到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人们才可以肯定:如果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那么语言学就只能是一门社会学科,也就是说,社会语言学就是语言学。^[5]

如今,社会语言学方兴未艾,它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研究领域越来越广。这本小书旨在把这种繁荣进行归纳整理。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语言的社会观之争	1
I. 索绪尔/梅耶:冲突起源	1
II.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5
III. 伯恩斯坦与语言障碍	11
IV. 威廉·布赖特:一次联合尝试	13
V. 拉波夫:社会语言学就是语言学	16
VI. 结论	18
第二章 语言的接触	20
I. 借词与相互影响	20
II. 近似语言	23
III. 语言的混合、代码的交替使用 和语言战略	26
IV. 克里奥尔语实验室	35
V. 作为媒介的语言	38
VI. 双言和语言冲突	42

第三章 行为与态度	47
I. 偏见	47
II. 安全/不安全	49
III. 肯定态度与否定态度	53
IV. 矫枉过正	56
V. 态度与语言的演变	59
第四章 语言变数与社会变数	67
I. 语言变数一例:语音变数	68
II. “美国黑人的本地话”	74
III. 语言变数与社会变数	78
IV. 语言市场	81
V. 跨方言变化、跨土话变化和历时变化: 行话的例子	84
VI. 语言集团还是社会集团?	89
第五章 社会语言学还是语言社会学?	95
I. 微观研究方法	95
II. 宏观研究方法	100
III. 社会网络与语言	105
IV.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的社会学	109
第六章 语言政策	114

I. 对多语的两管理方法：	
“活体内管理”和“活体外管理”	115
II. 对一种语言的干预	116
III. 对多种语言的干预	121
结束语	126
注释	128
参考书目	136

第一章 语言的社会观之争

I. 索绪尔/梅耶：冲突起源

法国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 (Antoine Meillet, 1866—1936 年) 在许多文章中强调语言的社会性, 或更确切地说, 把语言看成一种社会行为。他给这个特性赋予极为精确的内容。他在“词是如何转义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给这种“社会行为”下了一个定义, 同时明确地说明他受了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 (Emile Durkheim) 的影响:

——“不同语言的界线趋向于和被人们称为国家的社会集团的界线相吻合; 语言缺乏统一是近代国家的象征, 如比利时, 或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国家的象征, 如奥地利”;

——“因而, 语言活动完全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确如此, 这与迪尔凯姆提出的定义完全一致; 一种语言独立存在于每一个讲这种语言的个人之外, 尽管

它在这些个人之和以外没有任何实在性，它的普遍性决定了它存在于个人之外”；

——“迪尔凯姆解释社会行为的个人之外特点和强制性特点在语言活动中也是显而易见的。”^[6]

人们经常把安托万·梅耶说成是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年)的弟子。其实，《普通语言学教程》(遗著)一出版，梅耶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在对这本书所作的书评中指出“在把语言变化同它所依附的外部条件分割开来的同时，费迪南·德·索绪尔使它失去了实在性；使它成为一种必然无法解释的抽象物^[7]”。因为梅耶的观点至少与索绪尔的众多二分法之一，即区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二分法有矛盾，还和《教程》的最后一句话(“语言学惟一的和真正的对象是为语言本身的目的而被研究的语言本身”)有矛盾，即使那句话并不是索绪尔本人的，确切地说是出版者的结论，但它很好地概述了他的课程。有这种矛盾，因为人们可以在梅耶的全部作品中发现他对语言的社会性的断言同时包含着对语言行为的内在研究法和外在研究法以及对语言行为的共时研究法和历时研究法的融合。索绪尔把内在语言学与外在语言学对立起来，而梅耶却把它们结合起来；索绪尔区分共时研究法与历时研究法，而梅耶却在通过历史来解释结构。的确，只要人们一站到

普通语言学这块土地上,就会发现这两个人之间什么都有分歧。索绪尔致力于建立语言的抽象模式,梅耶却在为社会行为和一切都互相连着的体系之间的关系伤脑筋:对他来说,如果不参照社会性、不参照历时、不参照历史,人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语言行为。

梅耶对社会行为这一概念所下的定义精确明了,而索绪尔声称语言“是语言活动的社会部分”^[8]或“语言是一种社会机制”^[9]的那几段文字在理论上非常模糊。对他而言,所谓语言是一种社会机制说的一条总的原则、一种忠告,在他之后许多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重申了这一点,而从来没有提出过证实这种断言的启发性办法:他们提出了语言的社会性问题,然后跳到其它问题上去,去谈形式语言学、谈语言“本身和为其本身”。梅耶却相反,他认为这种断言应当具有有规律可循的内涵,它应该是语言学理论的关键问题:对他来说,语言同时是一种“社会行为”又是一种“互相连着的体系”,他不懈地试图考虑这种双重限定。他认为,在研究词汇(他研究人名、葡萄酒名、食用油名或印欧宗教名称)或对语言的传播(如拉丁语历史)感兴趣时这并非难事。在音位学领域或句法学领域里,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但他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使他成为一个先驱者。比如,人们

可以在这段文字中找到一种语气,它与后来人们在威廉·拉波夫的著作中发现的语气非常接近:“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语言学是一门社会学科,人们了解语言变化可借助的惟一可变成分是社会的变化”。^[10]

如果说索绪尔和梅耶使用几乎相同的语言,他们赋予它的意义却不同: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社会集团建立的,只有在这一点上它才是社会的;而我们曾看到,梅耶给社会行为的概念赋予的内涵非常明确,非常迪尔凯姆式的(何况他经常为迪尔凯姆主编的杂志《社会学之年》撰稿)。事实上,凡是索绪尔谨慎地区分结构与历史的地方,梅耶都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瑞士语言学家的努力主要是术语方面的(他试图制定语言学词汇以便在理论上确立这门科学),而梅耶的努力则是程序方面的:他总是希望人们重视语言的社会性。

由此可见,梅耶理论的中心思想:语言作为社会行为这一主题完全是反索绪尔的。当然,在《教程》发表之前,他的这一思想是潜意识的,但在《教程》发表之后就是有意识的了。索绪尔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史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远离这一主题。从现代语言学诞生之日起就出现了一种以结构主义为特点、主要注重语言的形式的论说和另一种强调语言的社

会功能的论说。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这两种论说平行发展,从来没有相撞。

II.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另一种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的方法。它诞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在 1894 年,卡尔·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发表了一篇对法语词汇的研究文章,他指出当时的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同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当然,在他的看法中有某种机械的成分:“古典语言伴随着封建君主制一起消亡了;在议会的论坛上诞生的浪漫语言将同议会政府一同延续下去”。^[11]但是,我们面对的只是将社会学的某种分析方法运用于语言行为的第一次尝试。

后来,从苏联那儿传来了一些最不可思议的或有时是最有创见的文章。不可思议一方值得一提的是尼古拉·马尔(Nicolai Marr, 1864—1934 年),他早在共产党人执政之前就建立了雅费语言(源自诺埃的第三个儿子的名字雅费,他的另两个儿子赛姆和沙姆的名字也曾分别用于指称闪语和含语)理论,并在后来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他的理论。他的想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马尔假设全世界的语言起

源相同,最早的交际是通过手势来完成的,然后出现了 *sal*、*ber*、*yôn* 和 *roch* 四个语音成分,它们构成了统治阶级(巫师)的语言。因而,从一开始语言就是政权的工具,并始终保留着社会阶层划分的痕迹。后来,这四个音节发生组合、异化、繁衍,从而产生全世界的各种语言。马尔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把语言分成四个发展阶段:

- 第一阶段:汉语、非洲语言;
- 第二阶段:芬兰—乌戈尔语、土耳其语;
- 第三阶段:高加索语和含语;
- 第四阶段:印欧语和闪语。

每一个阶段与一种“进步”相对应。不难看出,在这种分类的背后有着种族主义的痕迹,或者至少有欧洲中心论的痕迹。从马克思主义那儿获取一丝灵感后建立的这套构想自然对未来也有着其自己的看法:马尔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将导致只有一种语言出现,这种观点与语言反映阶级斗争的看法完全一致。然而,考虑到还是自己动手最好,他为了创造一种人工的国际语言而积极活动着,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语在苏联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得到相对广泛的传播。因为马尔理论后来成为官方理论。这种理论意欲实施马克思主义,如今看来显得非常肤浅,然而,人们从中